國家發展研究　第七卷第二期
2008 年 6 月　　頁 119-142

從殖民地看向東亞：留日學生蔡培火的身分意識

顏欣怡*

收稿日期：2007 年 5 月 30 日　　接受日期：2007 年 12 月 15 日

*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通訊處：台北縣汐止市忠三街 120 巷 83 號 1 樓；電話：0952-852611；E-mail: ce0129649@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摘要

本文的主旨，是透過閱讀蔡培火，試圖去了解日治時代台灣人的身份意識。從蔡培火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知道，身份認同的論述是可以超越國家與民族的窠臼。蔡培火從王道樂土的概念出發，指出當時日人治台之不合理性，而從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等等的政治參與的過程中，他同時也了解到台灣的主體意識之崛起；雖然運動的結果是失敗的，但對於民智之開化卻有不可抹滅之作用。而蔡培火不只是作為一個島內人，同時也作為一個留日學生，他在日留學期間，接觸到了王道樂土的思想。對於蔡培火來說，那正是解決日本人與台灣人身份認同的出路，直接跳過低層次的論述，從「東亞」，不僅可以解決日本本國與台灣島的緊張對峙關係，更可以成為東亞和平的橋樑。

關鍵詞：王道樂土、蔡培火、東亞、台灣意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在日本大正時期的台灣，台灣人身處被殖民的時空，不得不接受日本教育，因而在固有文化之上，由官方建置了一層更高尚或更有收編能力的思想體制。不過，固有文化所提供的身份意識或身份資源都具有潛在的抗拒力。同時，進入帝國體制意味著，台灣將成為帝國內部批判力量潛在的結盟或動員對象。故在檢視台灣人夾在政治與血緣之間的雙重身份時，採用日本流行的論述策略，結識日本的批判作家，利用他們的方法把中國固有文化的身份依據重現，成為合情合理的現象。相對於此，在重現的過程中，將固有文化的身份資源整合在日本身份之中，擷取日本知識界面對中國的各種主張，綜合運用，區隔台灣與中國，就形成了一連串足以啟發後世的身份策略嘗試。

本篇想要通過重讀留日的台灣青年蔡培火，以使今人去體會台灣人是否真的能透過日本人傳給台灣人的角度，開啟通往西方知識的大門，並將有關民族的知識介紹到台灣，如此藉由到日留學所受到的影響，導致台灣面對亞洲甚至是世界歷史的遽變時，是用一種非西方也非東方的視野來對位自身的處境。

貳、蔡培火其人

台灣自一九一〇年代以後留學日學生人數遽增，[1]這些留日學生後來便逐漸成為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的主力，也嚮往民主。蔡培火，便是其中一位，他出生於沒落的氏族家庭，由母親扶養長大，到日本的之後接受日本的師範教育，在三十二歲時受到植村正久牧師的感召，信仰了基督

[1] 吳文星，1992，《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頁 1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教。在信仰方面，他認為日本既然是當時的強國，台灣單依靠人力必然無法抵抗日本政府，是故，接受了植村正久牧師的說法，認為信仰基督教將來成有神之力可以相助。

蔡培火一生當中有兩個重要的運動，一為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一為台灣羅馬字運動，在前者無法受到日本官方的重視的情況，蔡培火更致力於推動羅馬字運動，將主力放置於文化層面的轉化，但是這個運動並沒有被當時的士紳接受，甚至引起中國知識分子的疑慮，也就草草落幕了。自從一九二九年他便在自己的日記當中寫下要努力致力於羅馬字運動，一九三一年他又積極設置講習會等，讓台灣人民來學習，相較於一九一九年中國推行的羅馬字運動，蔡培火希望能夠在純日本語言以及純中國文字中，尋求出一種有別兩者但是能夠代表台灣人民的語言文字，語言文字可以決定民族歷史記憶的塑造，歷史記憶也是民族性格素行的基石，從蔡培火推動羅馬字運動可以看出他接受多元共存的想法，既不追隨那遠去的祖國白話文學，但也不願意此島上的人民遺忘自己固有的傳統。是故，他放棄了自己認為較難推動的國字的拼音法，而去推動與以往不同但應該是學習簡易的文字拼音方法，試圖保留與日本統治者不同的文化型態，目的並非反抗或是反對日本，而是在日本之內爭取台灣的權利，凸顯台灣人民與日本的差異。在他的日記當中寫道：「咱者緊緊來學羅馬字……若是按呢，台灣就會向上，台灣就會換新，台灣就會活起來」。[2]

[2] 張漢裕編，2000，《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基金會，第五冊，頁1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兩個運動的啟發

一、台灣議會設置運動

台灣議會設置運動除了為島內爭取發言的空間，蔡培火也希望能夠藉由重建溝通的管道，使得台灣能夠有日本帝國一員的地位，而不再是日本殖民地。蔡培火心目中的台灣的民眾運動不等於民族運動，因為東亞本身是同源的民族，不需要去區分民族的不同，但是個別的差異性仍需要藉由自然的同化消除衝突。

議會設置運動並非單純的民族運動，是基於自治主義的基礎，但是就連日本母國都尚未達到民權自由的情況，蔡培火認為台灣可以保留自治，但是議會仍然是需要建立，以維持日本和台灣本土對話的機構。正因為缺乏溝通的管道，所以島內的衝突才會不斷升高，蔡培火本人也曾因為治警事件入獄，但是他並不認為這是日本帝國的暴政，反而歸咎到領台日人的官僚主義所致。在東京的學生運動以及後來的台灣議會設置運動，都是希望能夠將台灣的民情直接呈現到日本的政界面前。

嗚呼！台灣長久以來，已經被一派人物所壟斷……台灣似非日本全體的台灣，似屬某一黨派的專有……無論如何須先擺脫此輩的獨占，使台灣與日本全體總體有所交涉……我們多年來，在母國東京開始運動，儘量使台灣的實情暴露於中央政界。[3]

在母國的立憲基礎當中，台灣的立法基礎是特殊立法[4]，但是這種特殊立法權落入台灣總督的手中，任其專制行使，是有違憲法精神，且無

[3] 文中「一派人物」與同文後所寫的「彼等時常只將生番啦瘴疾拉介紹於本國，一直宣傳彼等困苦地與瘴煙蠻雨再戰鬥，炫耀自己功績，二則加強本國民對台灣的恐怖念頭，使其不關心台灣」，由此可見，蔡培火實指領台的日級官僚。引自張漢裕編，2000，《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基金會，第三冊，頁 142。

[4] 此處指得是「六三法」，「六三法」為一八九五年，台灣總督府實行軍政，以武力制壓領台初期的武力反抗。次年三月，結束軍政，頒布「法律第六十三號」（簡稱六三法），採用委任立法制度，授權台灣總督具有頒布法律效益之命令，使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視人民權利的官僚作風。唯有設置議會才能保證台灣人民的生存自由，並且將律法的設置權力重置台灣人民手中。

蔡培火堅信，台灣的特殊性必須被確立，但島內在此也有不同的意見，比如，與其設置台灣議會，不如直接要求中央參政權，而且此更符合同化主義的宗旨。但是蔡培火卻持反對的意見，原因有二：一為語言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等等；第二個理由是因為實行上有困難。在日本帝國當中的議會有殖民地的議員代表，等於是直接挑戰著日本的憲法，實行方法或是對於日本統治權威的衝擊更大，如果主張統治台灣不需要台灣總督，這會招致領台日人的強烈反對。台灣的自治是要等到台灣議會不再依附日本議會為止。

推動議會設置運動有一個重要的目的，證明同化政策[5]不是壓榨台灣人民的政策，但是在台灣的官僚手中卻將其實踐成為壓榨台灣人民的策略。蔡培火認為台灣即使是設置台灣議會也是根據自治主義，因為「六三法」對於台灣人民不公平；且自治主義的意義是「在日本主權之下，

灣被摒除在日本憲法保障之外。引用自黃秀政等人合著，2002，《台灣史》，台北：五南，頁 116。

5 蔡培火的同化主義有兩種，一為自然同化，一為人為同化。他認為自然的同化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有如公式變化的過程，這是物理界的變化；還有心理上的同化，這種耳濡目染的過程也是屬於自然的同化。而人為同化之起源是由於一國因領土狹小，不足以供其國人民之需時，不得已著眼其他之國土，將其他國家的土地據為己有，新君王為了求境內之一統，對於新住民所採取的政策，這就是同化政策之最善良之起源，也是人為同化之緣由。蔡培火認為，人為同化是困難的，因為人為同化必須建立在雙方心甘情願的感情基礎上面；再者是因為不同民族原本就是因為生活習慣等等的不同而造成不同的民族性格；最後則是，蔡培火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無法突然從某一民族轉變成為另一民族。但是蔡培火並沒有因此就否定人為同化的存在，他認為只要加上某些條件就可以讓同化策略推行，第一，就是其新領土與舊母國相隔離。第二，是需要尊重新領地原本的善良文化。第三，主張新舊領土雖然有不同的精神文化，但是這兩種精神文化必須將其視做是可以相互提攜的平等文明。第四則是，認為同化政策不能當作主要的統治政策，即不明說，但是可以強調新國民與舊國民的差異，如此，新國民就會體會到兩者之間的差別，而主動的去異求同。總而言之，一種以舊國民為中心的人為同化主義是不可能發生的，人為同化要發生是有其條件以及且有許多困難要去克服。只有將人為的同化主義放在順應自然的環境之下，才能夠產生同化應有的意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實行台灣自治」[6]。而台灣議會的設置意義是依據自治主義，但是因為日本的本土政治尚未達到真正的民權自由，蔡培火認為，台灣真正的實行自治一事可以保留，但求台灣議會的急速建立。對於領台日人等八萬餘人之不信任，造成了台灣人民與日本國民的對話的心理障礙。不過蔡培火認為台灣人民不信任的只有領台日人，對於日本本土的國民仍持有信心。蔡培火認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目的，是要努力在台灣以及日本本土政界建立對話橋樑，不要讓官僚的領台日人造成雙方的誤解。

請願動運在台灣近代史上具有其歷史意義，這除了是非武裝抗日的運動的之外，在蔡培火的想法中則認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不但代表著台灣人民具有思想上獨立性，且對抗的並非是日本帝國的統治地位，而是權威的「在台內地人」。

我們的國是立憲開明的國，立憲國民……是沒有絲毫的權威可使、像在臺內地人諸君既往的行動、老實是令人傷心、似此撤了立憲國民的體面……[7]

二、羅馬字運動

羅馬字運動衝擊到日本的教育政策，對於蔡培火或是台灣人民而言，日本的國語政策等同於將台灣民眾放置於殖民主義的地位，因為台灣的人民不可以使用漢語以及台語。對於日本人，使用中文等同於台灣仍是中國的領地，人民仍是中國人，但是對於台灣人而言，使用漢字是因為漢字是自己的文化傳統，對於中國有著文化的情感，但是對於清朝則未必有政治的忠誠。

在日本，是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殖民主義才被適用到日本的身上，日本十分缺乏統治本州以外的統治經驗，就連北海道也是直到一八八三年才成為日本國土的一部份，而當一八九五年台灣被割讓給日本的時

6 張漢裕編，2000，《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基金會，第三冊，頁 147。
7 參見蔡培火，〈我望內臺人反省〉，《台灣民報》，第八十六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候，日本的殖民統治經驗也是採取自國外留學生的經驗，如國內留學經濟學家福澤諭吉的影響。日本各界似乎認為一切都要學習國外，甚至，若不能像歐洲國家一樣擁有殖民地，感覺日本就無法成為先進國家。

蔡培火同意日本統治台灣的成果是十分值得重視的。在台灣有效率的統治，使得日本在面對處理殖民地經濟社會政治公共衛生方面，都有了初步的良好的對策，不但使得日本成為殖民者，更可以使日本列入帝國主義國家之林，再加上接下來打敗了俄國，更使得日本成為當時世界強國之一，日本的殖民主義自此轉向。[8]台灣的總督從武官總督轉到文官總督，再轉到武官總督，第二次的轉變時機是在滿洲事變以後，因為台灣被視為是前進南洋的跳板。

國語教育的實行被視為是軍國主義以及民粹主義的實現，蔡培火認為錯誤的國語政策是同化主義的遺毒。經過了三十年的統治，台灣人民從中學到的教訓就是不能相信台灣官僚的教育制度，因為都只是愚民教育。台灣總督府對於台灣的人民的殖民地教育，一方面繼承後藤新平的無差別政策，一方面又對台灣人民實行差別化教育，尤其是台灣的高等教育中台灣人人數偏少。蔡培火自日本受教育之後，深感台灣人受教權遭到限制。雖然到了文官總督時期，開始施行內地延長主義，但是蔡培火認為這只是同化主義的換湯不換藥，「其精神基礎，歸根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9]

蔡培火在自己受教育時便深感日本的教育對於台灣有著不公平的待遇，而原本使用的漢字為文言文，艱深難懂，為了普及白話文字，使一般民眾可以識字，加上接觸了基督教的羅馬白話字，蔡培火花了三天

8　Yosaburo Takekoshi, 1907,"*Japanese rule in Formosa*", New York, London, Bombay and Calcutta, Longmans, Green, and co., p.83-84

9　張漢裕編，2000，《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基金會，第三冊，頁 1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便有學日文基本能力，他認為此一方法簡單易學，便自創了以日本假名拼寫台語的白話字母，[10]成為蔡培火畢生致力活動。

羅馬字運動對於蔡培火具有深遠的意義，他認為語言是種溝通的工具，在日治時代可以聯繫本島人與內地人，而在國民政府遷台後，羅馬字運動仍然需要持續進行，因為國民政府遷台之後，也需要跟原本住於台灣土地的人打交道，而彼此要親近最好的武方式是突破語言的隔閡，這時，羅馬字便可以派上用場。[11]不論是日治時期或是國民政府時期，都可以看出蔡培火對台灣教育之憂心，特別是他為台灣民智之開展以及獨立人格所做的努力，都可以看到他在日本所受的西方近代化的思潮的影響。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及羅馬字運動，是蔡培火在日治時兩個主要的活動，這兩個運動重要的並非其所帶來的影響或是成果。與其說是蔡培火面對日本帝國的抵抗，倒不如說是身為一個殖民地的知識分子，在看到了日本的知識界傳播的進步與科學的觀念，感覺到台灣人民的民智落後，加上受到了在台日人的欺壓，而發起運動。他的的最終目的也希望台灣人民能夠自覺。畢竟，單純以反抗日本帝國的統治而無自覺的話對於台灣的長久發展不會有助益。

如果認真處裡台灣與日本的問題，不可避免必須涉及到與中國的關係。而日本知識界則正浸淫在各種以東亞為核心的亞洲主義主張中，使得以蔡培火為典型的一種對「台灣」這個特殊身份產生的意向已經成形，既然東亞這種超脫國界的身份可以存在且被推行，同理，在台灣的台灣人理當也可以在日本統治下有自己的的身份。

[10] 李毓嵐，〈蔡培火與台灣白話字運動〉，《近代中國》，第 155 期，頁 24。
[11] 蔡培火編著，1969，《國語閩南語對照常用詞典》，台北：正中，頁 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肆、從台灣出發到東亞

蔡培火不喜歡國粹的民族主義思想，因為西方的科學主義進步卻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是到了東京大阪神戶等地方，眼見當地的繁榮衝擊，[12]主張國家應由德治，[13]王道是先於政道，只要是秉持著王道統治，自然就可以成為正統。表現在台灣方面，他主張，即使是日本的統治也可以為台灣帶來富足穩定的生活。他認為，對於日本人來說，台灣並非日本的殖民地，但也非日本本土。表現在政治體制以及教育制度方面，蔡培火本身也深知此點認識的重要性，故對他來說，承認日本的統制，維持現狀，才是對穩定台灣未來的不二法門，讓日本的統治階層和台灣人民之間原本緊張的對峙關係也得以有所緩和。於是乎，他提倡台灣議會運動，倡導地方自治，承認日本的中央政權。另一方面，處在日本統治下台灣，本身的身份意識實現需要被突顯。因為，雖然是日本統治，但是「台灣」本身的地位仍無法被磨滅，[14]表現於外，便是找回台灣語言，故他開始主張白話文運動。這些均非直接反對日本的政權，反而是同意日本的政權，在此前提之下，才進一步去尋求台灣安身立命的空間[15]。

他在日本留學過程當中耳濡目染，從歷史的感情上與實際的經濟利益兩方面，接受了當時東亞為一個完整的地理概念。他在大戰之中寫的《東亞之子如斯說》，反映了身為一個血緣上的台灣人以及國籍上的日本人，再加上地理空間裡離鄉的留學生，為了尋求一種身份的慰藉，依附於日本輿論界流行的這種大東亞身份，從而能夠跳脫出國家的框架，

[12] 張漢裕編，2000，《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基金會，第三冊，頁 215。
[13] 張漢裕編，2000，《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基金會，第三冊，頁 239。
[14] 自滿洲國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滿洲國的政權由滿清變為日本，但是滿洲國本身仍存有。
[15] 台灣的政治也逐漸走向改革。且此種改革的發動是由下層社會開始，由基本的地方自治制度面發端，蔡培火認為台灣在這方面的成功是種實驗的成功，也是武士道精神的表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再拘泥傳統的以血緣或是土地為依據的身份認同，而是去設想一種共同的歷史記憶。將心比心，依此類推，則不論是身處於中國的大陸同胞，或是在日本的臺灣人，更或是在台灣的日本人，他們都可以因為東亞這個名詞而有共同的依歸。對他們來說，東亞作為一種身份所能提供的，是讓每個人的生存空間或活動空間不再只侷限於自己所出生的地方。

蔡培火認為在東亞的框架之下，台灣可以有自己的立身之地，因為既然認為台灣平等的處於東亞，則東亞的存在就可以賦予台灣人新的身份，不必再藉由國籍上或是種族間的認同。即使東亞是處於日本統治之下，這種統治只要是符合王道統治，是對於台灣人民來說最為合適的統治方式，可以為台灣人民乃至於所有的東亞帶來最大的幸福，如此這種統治便帶有正當性，統治即有合理性。

他對台灣身份的認識可以分為兩個部份，一部分是來自日本的對台灣的看法，另一部分則是自中國的角度出發來看台灣。在蔡培火的觀念當中，所謂的中國是個政治國度，但是因為中國領土幅度過大，所以各地的社會都有不同的特色，可說是個混合的社會。在中國血緣文化之內，台灣是一個有特殊定位的社會。他則把台灣與中國和日本的三角特殊關係看成是東亞和平關係的基點。另外，還可拿他對滿洲國的看法做參照。他認為滿洲國的存在是可以被允許的，不論是誰統治滿州，只要能夠帶給滿洲國人民最大的福利，就是最適合的統治者。或許可以就從這個立場端詳出他對台灣定位的想法，那就是，不論統治台灣的是日本人或是清廷，只要能夠秉持著王道統治，帶給當地人民最大利益就好。他把日本和滿洲國的關係，當成是中日親善的第一步，當滿洲國順利成立之際，蔡培火在日誌中對全國九千萬同胞表示，反對用暴力改革，並追隨天皇改革，即令排除中國，由日、滿共同建立一個社會也無可厚非。蔡培火更認為，滿洲國的成敗影響日本民族的興衰，也影響東洋民族的未來。[16]

[16] 張漢裕編，2000，《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基金會，第三冊，頁 317-3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以看出，蔡培火的東亞觀，是受到日本知識界流行思想的影響，他通過歸納日本的東亞論述，除了將台灣與日本視為可團結的一種結合體之外，同時還相信，藉由中國和日本的親善，將可以達到東亞的和平。蔡培火在大戰期間轉而主張的是王道統治，由王道統治來看中國、日本與台灣三者之間的關係。蔡培火在一生當中寫過許多詩歌、文章。其中，長篇的著作有兩本，一為《告日本國民書》，一為《東亞之子如斯想》。這兩篇分別在一九二八年以及一九三八年寫成，可以代表蔡培火在青年時代主要的思想，更可以看出當時社會以及歷史潮流帶給蔡培火的本人的影響。

一、《告日本國民書》－從台灣島內發聲

《告日本國民書》是蔡培火在一九二八年二月於日本寫成，開宗明義的表明是一個殖民地人是寫給殖民母國看的，同時也是台灣人寫給日本人；行文之中可以明顯看出蔡培火以台灣人作為對象抒發他對於日本、台灣本島、東亞等人文地理的情懷。尤其是身為一個台灣人，蔡培火不但期望自己的聲音被聽見，也期望自己的身分能夠被日本同胞所接受以及認同，特別是在日本的統治政策同化主義規劃之下。寄望台灣的政治地位能夠有所改變。

同化主義在台灣引起敵我概念的分野，因為有殖民地台灣以及殖民母國日本，所以有同化主義的出現。但是蔡培火在看到了日本也施行了普通選舉、實行政黨政治，他認為，日本人也曾經被西方人支配，但是對於台灣卻缺乏同為被支配著的同理心；日本已經脫離了被支配的地位，並且邁向了民主，應該同時改善台灣的地位。

蔡培火以批評在台日人的官僚主義出發，他並不是要直接批評日本政府所採取的統治政策，同化主義。他認為日本政府的作為並不霸道，但是到了台灣，總督以及官僚的表現就變成專制。這層關係的蒙蔽使得日本人民以及臺灣人民產生了帝國壓迫殖民地的現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台灣的官僚，惡用其特別立法權，施行極端以母國人（分全體母國人，祇一少部份）為本位的榨取政策，對於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極盡庇護母國人，而強施榨取於我們本島人之故。[17]

蔡培火認為台灣人同胞與日本同胞因為台灣官僚的阻隔，雖然台灣已經在日本統治下三十餘年，但是卻對於日本人所知不多，甚為可惜。甚至於對於日本人的認識僅限於日本的帝國主義，蔡培火認為這對於日本的帝國的未來也有不良的影響。

台灣的人民對於統治者是清朝或是日本，台灣人民都具有自由選擇的權利；日本作為台灣的統治者，是台灣的人民的自由選擇。那麼，日本的統治者對台灣的人民態度又是如何，蔡培火認為天皇對於其統治地的人民是一視同仁，而日本的官僚為了讓台灣的人民能夠與母國享受相同待遇，主張「需變換汝曹的素質而同化於我們」[18]。台灣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習俗皆需學習母國人，是以，台灣人與母國人才能立於相同地位。

這只是將台灣人立於奴隸地位，因為同化主義實行三十年來，只有虛名，台灣人的地反而受到了毒害，特明是在一八九六年[19]的「六三法」的設置，蔡培火認為這是「制定了萬病之源的惡法律……將制訂特別法律的權限授與台灣總督」。[20]但是台灣總督卻將此濫用，蔡培火認為他們誤植「一視同仁」的聖旨。

二、《東亞之子如斯想》－東亞概念出現

蔡培火的短篇著作《東亞之子如斯想》中可以看出蔡培火對於台灣地位的看法。蔡培火將台灣視作是日本帝國的一部份，身為日本帝國

[17] 張漢裕編，2000，《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基金會，第三冊，頁 121。
[18] 張漢裕編，2000，《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基金會，第三冊，頁 123。
[19] 明治二十九年。
[20] 張漢裕編，2000，《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基金會，第三冊，頁 1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蔡培火經歷的滿洲國的建立，且將日本的學說從民主思想轉變到接受滿洲國的東亞理論，襯托出蔡培火對於近代、以及東亞觀念的認識背景。

對於東亞，蔡培火主要觀察的對象是中國與日本。東亞的概念對蔡培火而言，不僅僅只是個區域，更具有相同的文化淵源，甚至可以說是同一種族（新東亞人，新日本人等同於台灣人），其所主張的東亞是不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例如白話文字運動，非僅單純具有教化人民的功用，反而是東亞連結的橋樑。[21]

從同胞到東洋，蔡培火敘事時有了跨國界的意識出現，但是民族意識並沒有消失，反而有不同層次的認同意識出現。近代的中國、日本或是東洋的國家，都遭受到西方國家實質上的入侵，不論是在政治、經濟或是文化方面皆然，也是因為如此，國家保障人民的功用才被突顯，武力強弱成為國家性格的重要特色，保衛人民不受列強入侵，甚至淪為殖民地，成為國家的重要課題。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的概念反而顯出其薄弱。近代以前，中國或是日本的統治體系以家天下或是天皇制度來統治人民，對於人民來說，沒有明確的政府體制存在，官僚只有執行操作的功用。國家的界線對自己來說沒有意義，如果在西方可以帶給人民安全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國家，在東方對於國家的忠誠等於對皇帝或是天皇的忠誠。

對於蔡培火而言，即便有近代國家的出現，對政治信仰是否在國家這個虛擬的主體上，仍持保留的態度，特別是當代表國家的政府機關在蔡培火的政治經驗中不被信任，他便承續了中國傳統的孔孟觀念，主張王道的思想，將國家性格排除；最明顯的例子便是蔡培火再主張中日親善一事，中日親善可行的方法是透過人民以及文化交流等等，而不是透過中國對於日本兩個國家的談判來完成。

[21] 當白話文字運動推行到東亞地區，此區的人民可以藉由同一文字來溝通，而此一文字是被大家所認可的，不具有優劣性質的文化價值批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蔡培火這種看似缺乏民族主義的東亞觀，其實反映出的是東亞本身就蘊藏廣義的民族主義的可能。對於東亞來說，還有東亞本身的存在來自於文化、歷史的傳統淵源；東亞的結合不僅是因為地理上的接近，也是因為實際利益的考量。缺乏國家性以及民族的東亞性可以藉由王道來結合，當王道的存在與否成為每個東亞人的共同的目標，那麼，東亞的和平便可以實現。

從蔡培火相隔十年，前後兩篇長篇文章可以看出，蔡培火從原本關注同化主義到轉變放大到東洋。同化主義原本是隨著日本帝國的統治政策而隨風起舞，特別是當同化主義套用在台灣身上成為欺壓人民的藉口時，蔡培火看到了也接收日本的民主思潮，他認為爭取民主有助於台灣人民取得不對抗台灣總督的應對方法。但是，就在日本國內的政局的轉變以及國際情勢的變化，蔡培火也跟隨著轉變，特別是在爭取議會設置運動屢屢失敗毫無進展的當下，當日本提出了王道樂土的概念時，蔡培火便發現了在東洋當中，日本可以尋求到自己的立身地位，同理，台灣也可以；特別是，王道的概念原本就源自於漢文化，接受王道的概念不但可以延續漢文化的傳統，更可以用以改善台灣處於劣勢的地位，同時與日本在東洋當中相提並論。

伍、王道樂土下的台灣意識

身為留日學生，蔡培火眼見西方的民主主義浪潮在日本帶來影響，從政治制度以及城市文明改變，在在都使得蔡培火深刻體認到西方進步主義以及科學實証觀念所造成鉅幅轉變。從政治體制來看，在國際環境的影響下，日本的政界以及思想界都受到了民主主義思潮的影響，這股思潮對於日本的新進知識分子來說，不僅是日本本土，對於日本來說十分重要的新附地，台灣，也應該有其民主思潮的進步，不應該只用殖民主義的統治方式來看待台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蔡培火不認為反對同化主義會對於台灣人民有絕對的好處，反而可能因此受到擠壓。更何況，日本的統治對於台灣來說，也有帶來光明的一面，比方說教育和衛生等等的進步。雖說一路走來島內出現許許多多不同的聲浪，不但有來自領台日本人的反對，還有島內不同聲音，甚至同一陣營的同伴都不願意全力支持，但是對於蔡培火而言，改變台灣開啟民智遠比對抗日本的統治政權更為重要。世界各地在母國受教的千千萬灣被殖民者，經常有類似的心得。

蔡培火到了日本，接觸到了西洋文化，也信仰了基督教，西方文化歷史的精髓是以基督文明展開，蔡培火本人便能很快接受民主主義以及科學主義等思潮。信仰基督教不但在精神上也在實質上對蔡培火有所助益，例如植村正久、矢內原忠雄以及吉野作造等人，都是教徒，來自帝國核心的信仰，聯繫了在各國後進地區努力的知識分子。

日本的近代化浪潮感染到了台灣，但是，卻沒有感染到領台日人，蔡培火等台灣的知識分子面對此種斷層，自然只有直接求助於日本帝國，建議設置台灣議會，但是，卻被視做為反抗日本帝國統治的運動，這是因為蔡培火浸淫在民族運動的氛圍中，留戀來自閩南的台灣話，當然對日本統治者造成心理威脅，不過，蔡培火等人所運用的簽名、連署、宣傳和講習會等等方法，都是和平的爭取台灣人的權利，這些都是自日本本土民主浪潮中學習到的方式。蔡培火認為進步的不只應該存在知識分子，也應該傳播給台灣人民，只要台灣的人民能夠學習了近代化的腳步，那麼，日本帝國對台灣的統治，例如標榜以同化主義來開智台灣的領導方針，勢必面臨修改。他開啟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以及羅馬字運動，正是帶領台灣進入近代化的進程的努力。

從台灣意識來看，可以分為「文化認同」以及「政治認同」兩方面，而這兩種認同正是組成台灣意識不可以分割的兩部份。[22]從大正時期到

[22] 黃俊傑，2006，《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頁 1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昭和初期政治運動的混亂看來，台灣意識中的政治認同是處在大染缸的狀態，不僅對當下的政治認同無法達到共識；而文化認同亦然。政治上，到底是日本帝國、中國祖國還是台灣自己，文化認同也伴隨的台灣政治身份的混亂而有搖擺不定。蔡培火從滿洲國的存在得到靈感，相信只要文化的認同可以找到共同出路，並在台灣意識的組成中，把對王道文化認同的成分放大，期望文化認同可以穿越國族國家的政治疆界，將東洋各民族納入王道的光輝之下，人民便都可以安身。王道文化的概念就來自儒家文明，即使是日本的統治者，只要行為符合王道，日本帝國也可以是認政治意識的基礎。

當建立滿洲國的，提出王道樂土的理想，不但為日本帝國在東洋中找到可以運作的空間，也為台灣無以為恃的地位找到了出口，因為當時台灣處在於祖國中國以及殖民者日本之間的混亂地位，王道樂土的理想出現，忽視流行的民族國家作為劃境標準，轉而訴求文明範圍，利用日本、中國與台灣都處於儒家文明圈當中，不正好說明了台灣也是可以和中國及日本平等地處在王道的理想下？面對王道理想的訴求，蔡培火再次在本島人和內地人之間尋求平衡點，那個平衡點既不存在於日本人也不在台灣人或中國人身上，而是在東亞人的大懷抱中。

這美好的理想出現來自台灣的精神上祖國，而建立者則是台灣當時的統治者日本，蔡培火找到了說服日本統治者以及台灣住民的美好理想，當東洋出現紛擾，蔡培火固然無法緩解他們，但卻在觀念上找到出路，而在這當中，台灣便扮演重要的關鍵角色，台灣所處文化的中日並存的特殊位置不再是台灣的弱勢，反而是東亞的優勢。日中停戰，王道樂土的觀念也可以因此傳播至中國，台灣便不再是次於日本或中國的依附之地，而是東亞王道不可或缺的關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陸、結論：從日本觀察到自身

多數研究台灣日治時期的政治運動或是民眾運動者，都不免會陷入對抗或是屈從的窠臼當中。蔡培火的行為卻並非如此，陳翠蓮教授將蔡培火的路線分類在兩者之外，而謂之為採取自治主義的路線。[23]將蔡培火在日治時期的活動是視做為自治主義所做的努力。雖說蔡培火致力於運動的目標並非要反抗日本人，不過，不論是哪個運動，都被在台日本統治階級視為大敵，蔡培火多次與臺灣總督協調，且依照警察法的程序申請活動，但都沒有得到官方認可。而蔡培火仍認為他的作為不但沒有反抗日本帝國統治的意味，相反的，是有助於日本帝國的統治，而且也可以開啟台灣民智，他在妥協中的堅持運用包括西方的、中國的與日本的文化資源，可以是殖民地政治中具有創意的典型，但是也遭到各方反對，有時甚至也引來本島人的反彈。蔡培火雖面對荊棘難行的路途，他仍選擇持續為台灣的住民尋求有利的途徑：

> 我望台灣人同胞，你們要早識時勢、改變自己的頭貌、捨棄從來的奴隸根性、造成完美的人格。再一面、我望內地人同胞……做了好模樣給臺灣人看才是、就是希望大家表現立憲國所應有得襟懷拉。[24]

在推行運動的同時，蔡培火也將現代的進步觀念帶給了台灣的住民；介紹了民主思潮以及科學主義等等西方的觀念，在日本的「一視同仁」的教育政策之下，[25]台灣的民眾可以從不同的管道得到意見，開始

[23] 陳翠蓮，〈抵抗與屈從之外：以日治時期自治主義路線為主的探討〉，《政治科學論叢》，第十八期，頁 142。
[24] 蔡培火，〈我望內臺人之反省〉《臺灣民報》第八十八期，大正十五年一月一日。
[25] 陳培豐，〈殖民地臺灣國語「同化」教育的誕生—伊澤修二關於教化、文明與國體的思考〉，《新史學》，第十二卷一期，頁 1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接受多元文化混融，不再只是單純「屈從」或是「對抗」的路線：無法單純的「對抗」，因為日本帝國畢竟是台灣的現有的統治者，若是反抗統治者，只有招來流血衝突；而若是完全「屈從」，又受到領台日人的不公平的欺壓，台灣人也無法完全的信服。可是蔡培火在近代化的浪潮所中找到解決台灣政治意識問題的方法，只能停留在概念與論述的層次，與時代中的民族主義浪潮不盡相符。

如果說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的目標是日本人，那麼羅馬字運動的運動目標便是台灣人，而前者以台灣不同的種族為前提要求自治，後者以祖國語言為前提要求自覺，竟又都潛在地讓中國身份介入。蔡培火在日治時期最主要的兩個活動，一個是面對統治者，一個面對自己的同胞，不論是哪種，蔡培火都期望努力去改變現狀，讓台灣的住民可以獲得更好的地位以及生活。在運動進行的同時，蔡培火也把近代化的思維帶入台灣，希望台灣的人民能面對近代化的衝擊，發現自身的地位，以及注意到台灣本身的存在意識。這樣的意識一直延續到抗戰之後，即使身為光復大陸設計委員，他也不忘用閩南語注音國父思想，讓台灣作為身分能與台灣作為身分之間，取得平衡。蔡培火最大的文化遺產，就是培養「合而不同」的台灣意識；這種意識既不抵抗日本殖民地統治也不疏離於中國文化，與一般認為以對抗建立認同的模式迥然不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份：

（一）書籍

吳文星

1992，《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

張漢裕編

2000，《蔡培火全集》，台北：吳三連基金會，第一至第七冊。

黃秀政等人合著

2002，《台灣史》，台北：五南。

黃俊傑

2006，《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蔡培火編著

1969，《國語閩南語對照常用詞典》，台北：正中。

（二）期刊、論文

李毓嵐

〈蔡培火與台灣白話字運動〉，《近代中國》，第 155 期。

陳培豐

〈殖民地臺灣國語「同化」教育的誕生－伊澤修二關於教化、文明與國體的思考〉，《新史學》，第十二卷一期。

陳瑋芬

－〈自我的客體化與普遍化－近代日本的「東洋」論及隱匿其中的「西洋」與「支那」〉，《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十八期。

－〈「道」、「王道」、「皇道」在近代日本的詮釋〉，《中山人文學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翠蓮
〈抵抗與屈從之外：以日治時期自治主義路線為主的探討〉，《政治科學論叢》，第十八期。
蔡培火
〈吾人之同化觀〉，《台灣青年》，第一卷第三期。
〈終日親善の要諦〉，《台灣青年》，第三卷第三期。

二、英文部分：

（一）書籍

Takekoshi, Yosaburo, *"Japanese rule in Formosa"*, New York, London, Bombay and Calcutta,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East Asia identity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Ruled Period through Reading Cai Pei-Huo' Consciousness of Taiwanese.

Xin-Yi Yan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trying to understand identity consciousness of Taiwanese during the Japan-ruled period through reading Cai Pei-Huo.

Form his view , we can know the discourse of identity can beyond be the limits of states and nations. He begins from the idea of "Oodoorakudo" criticize the policies of Japan . Thoug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movement of petition for Council, he also noticed that the rise of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 Although the movement failed, it still had enormous effect upon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ai Pei-Huo not only as a Taiwanese, but also as a foreign student in Japan. During his study at Japan, he was aware of the idea of “Oodoorakudo”, which is the way to solute the different concept of Japan and Taiwan identies for him. Through the identity of “East-Asia”, it can mitigate the tension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Island, become the bridge of peace in East-Asia.

Keywords: Oodoorakudo, Cai Pei-Huo, East-Asia,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